

# “太昊”“伏羲”之“人首龙蛇身”新论

杨 阳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太昊伏羲氏”是中国传说中的上古人文始祖。“太昊”与“伏羲”之名虽始见于战国文献,但在汉代之前二名并未连文。考释符合太昊伏羲传说中形象、地望的遗物和遗迹,可见早期中国就有了成熟的龙蛇图腾以及相关崇拜意识,并让伏羲、太昊实为二人且分掌南、北地域的证据链得到进一步明晰。太昊“龙纪”说明其部族意识为龙崇拜,而伏羲“蛇身”则证明伏羲部落的崇蛇思维,是故两者的图腾族徽、所处地区皆有所不同。太昊是西北地区部落祖神,伏羲则是西南民族的始祖,伏羲年份亦早于太昊。从史前的石刻、纹饰再到后世的画像与墓俑,这些考古发现的大量承载“人首龙蛇身”形制遗物,其嬗变历程是一脉相承的,皆源于远古太昊伏羲之龙蛇图腾,并彰显了古人对生命认知、宗教观念的精神寄托及人文情怀。

**关键词:**太昊;伏羲;人首龙蛇身;人文传说;精神意涵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6)01-0148-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60113

学界对太昊伏羲的相关神话传说的探索考证是一个较为传统的话题,目前业已研讨多年。前贤成果或局限为对“人首龙蛇身”相关的图案、画像砖及神煞俑等遗物的蠡测;或从文字、文化及文学等视角对太昊伏羲传说进行解读。关于太昊伏羲的地望探究,学界根据文献记载对此推测颇有争论,主要划分为“北方说”和“南方说”。虽然前贤在探讨“伏羲”与“太昊”是分别的二者方面已有了一些观点,但很少结合考古实物对“太昊”“伏羲”进行分别考释。学界现状为本文留下足够的学术探讨空间。我们实事求是地解读实物遗存中体现的先民意识,发现隐藏在历史烟雾最深处的早期意识,更好地体现“以物证史”和“透物见人”。本文根据太昊、伏羲的文献记载,结合相关遗物的产生、演进、传播、变体乃至文化扩容展开新的探讨,聚焦田野考察及最新考古出土物,深入探讨神话及遗物背后反映的史实线索,提出自己的新看法,请方家指正。

## 一、“太昊”“伏羲”之图腾形象考

一切历史遗物及文献都是人类创作并遗留下来的。今西北甘肃地区发现了两件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时期的鲵鱼纹彩陶瓶,一件绘有人面鲵鱼纹图案(图1),另一件人面鲵鱼纹图案则有了下足(图

**收稿日期:**2024-11-04

**作者简介:**杨阳,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考古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西南考古与历史文化、文明起源与发展、先秦史。

**基金项目:**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先秦巴与蜀两大文化区信仰进程比较”(CYB23227);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中特理论项目“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三峡文化生成研究”(2025ZTZD18)。

2)<sup>[1]</sup>。第一件陶瓶上的图案为人首结合鳞身的造型,该生物尾部与头相连,整体形象似“U”形;而有了下足的人首鳞身者则更加贴合“龙”的形象。



图1 公元前40世纪 甘肃西坪黑彩陶瓶  
38.4×7×10.8厘米 甘肃省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2 公元前40世纪 甘肃傅家门黑彩陶瓶  
18.5×5.5×5.7厘米 甘肃省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中国远古神话中的创世神形象多为人首结合龙蛇之身造型,这种生物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是古人图腾及祖先崇拜的体现,并反映出古人的原始理性思维,其中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就是这类型的神灵。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大皞氏以龙纪……”<sup>[2]279-280</sup> 此即反映当年太昊部落的龙崇拜意识。武文、何新等先生赞同陶瓶上这些“人首鳞身”纹饰为太昊伏羲之祖型<sup>[3]</sup>,笔者认同之。甘肃地区彩陶瓶上纹饰或即映射出太昊氏族的图腾理念。又《陈州府志》《淮阳县志》载,太昊活动之时段就在距今6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期<sup>[4]</sup>。恰好在6500年前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就发现用蚌摆成的“中国第一龙”(图3)<sup>[5]</sup>,这是史前中国龙崇拜意识成熟的重要物证,抑或明晰传说中太昊氏族的时间脉络。闻一多先生曰:“龙在最初本是一种大蛇的名字。”<sup>[6]27</sup> 龙作为一种人文动物,是源于先民对蛇的衍化、美化及崇拜。



图3 濮阳西水坡蚌塑龙

图片来源:孙德莹,丁清贤,赵连生,等. 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1988(1):3.

在距今约 5 000 年的陕西铜川前崩遗址,发现了一件塑有人首壁虎纹的陶罐(图 4)<sup>[7]</sup>,我们认为其同仰韶时期的鲛鱼纹彩陶瓶,亦为人首龙身之图案。所以,在 6 000 年前的古西北及中原一带,传世神话中的人首龙身形象即在考古遗物的图案中得到多处证实。而甘陕地区这些刻画有太昊氏族图腾的陶器也许不是一般生活用具,或已具备用于祭祀及陪葬的精神意涵。对比几乎同时期的西亚地区,如伊拉克的拉格什遗址发现有一件 4 000 年以上的反映冥界神宁吉什兹达信息的祭祀瓶(图 5),瓶上刻有双蛇纹图案和祭祀文字<sup>[8]</sup>。我们认为,此双蛇相缠造型说明即使神灵形象仍然还在“拟兽”阶段,但不排除已具备“拟人”的特性,或有象征男女夫妇对偶形象的含义。因此,西北地区的史前太昊图案陶瓶,或同西亚地区的双蛇纹祭祀瓶含义,皆是某种宗教祭神用品。



图 4 公元前 30 世纪 陕西前崩人首龙身塑像陶罐  
17×14.2×1.305 厘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 5 公元前 20 世纪 拉格什双蛇纹祭祀瓶  
28.7×6×8 厘米 法国卢浮宫馆藏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南方,城背溪文化东门头遗址发现一件更古老的距今 8 000 年左右的石刻(图 6)<sup>[9]</sup><sup>73</sup>。从图案上醒目的太阳看,其或彰显了崇拜太阳的某种巫术活动,甚至很可能是记录当年某首领的形象,透露出当时崇拜太阳的原始意识已弥漫了三峡地区<sup>[10]</sup>。我们认为,东门头石刻映衬的是先民的崇拜主神开始由自然神发展到祖先神的历程,其中重要过渡时期就是对人神合一的这种“太阳神人”的崇拜,亦直接证明三峡先民崇拜的早期主神就是太阳神,对此笔者亦有拙文论之<sup>[11]</sup>。所以,东门头石刻证明的是 8 000 年前的三峡地区先民思维里已产生对男性祖先首领的崇拜意识,故而把人与太阳形象进行了巧妙结合。



图 6 公元前 60 世纪 东门头石刻 105×20×12 厘米 湖北省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另外,东门头石刻上的人物图案,其身軀部位修长并具有尾尖,四肢细小,当不是正常人类造型,不排除进行了“拟兽化”刻写,似为“人首与蜥蜴身”形象。对此,笔者赞同国光红观点<sup>[12]</sup>,伏羲即“虺蜴”,以蜥蜴为图腾。石刻人物不排除就是祖神伏羲形象的体现。《淮南子·天文训》载:“东方木也,其帝太皞……”<sup>[13]</sup><sup>148</sup>可见太昊也是象征东方的木德王。太阳从东方升起,而“太昊”之“昊”,为“日”“天”之结合,以示太阳经天而行,实乃“光明”之意。东门头石刻反映的是太阳光照之下的神人太昊伏羲,这更加印证了日神太阳和蜥蜴鳄鱼之类即象征伏羲部族的图腾。而蜥蜴、鳄鱼及蛇类皆鳞身,中国龙就体现出浓厚的蜥、鳄特点。如《拾遗记》云:“蛇身之神,即羲皇也。”<sup>[14]</sup><sup>33</sup>我们认为,湖北发现的这件石刻上反映的头顶太阳的“神人”,也是证实太昊伏羲远古传说的重要物证,即8000年前南方三峡地区就出现了或为伏羲女娲的史前部族。

从今西南三峡至西北甘陕的广大地区,都出现了刻画有人首龙蛇身图案的早期遗物。上古时代,生存环境的恶劣让先民对族群繁衍十分推崇渴望,而蛇、鱼以及蜥蜴之类是繁殖能力较强的生物,故而先民基于生殖崇拜的早期思维,开始信奉这些生物为神灵,并将其作为部族图腾标志加以崇拜。而这些石刻、陶罐以及摆塑物上的神物图案,无疑证明了华夏大地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了成熟的龙蛇形象图案,且其内涵或与太昊伏羲传说有所关联。传说当年太昊伏羲把鹿、虎、鳄、蜥、鲤、鹰、鲸、鲨以及蟒蛇等生物图腾融合后,最终创造了龙的形象<sup>[15]</sup><sup>19</sup>。所以,太昊伏羲部落或许存在中国最早的龙形象及其崇拜意识,其部族甚至不排除是由多种“龙”组成的部落联盟集团。

## 二、“太昊”“伏羲”之地望方位释

在相关文献记载中,“太昊”与“伏羲”最迟在汉代之前是不同的二人,直到西汉以来才并称一体。太昊“龙纪”说明其部族意识或为龙崇拜观念,而伏羲“蛇身”则证明伏羲部落的崇蛇思维。故而我们认为,二人既然具有不同的图腾族徽,他们所处地域亦有所不同。

### (一)太昊之虚“陈”探

“陈,大皞之虚也。”即太昊都城在“陈”。“陈”是中原地区的富庶之地,至春秋战国时又是陈国和楚国的都城。1980年河南淮阳发现一座新石器后期的古城平粮台遗址。笔者赞同徐金法等看法<sup>[4]</sup>,平粮台古城或为太昊之虚,平粮台一期文化恰好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从而证明了6000年前淮阳即为早期部落的聚居之地。

平粮台城址的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85米,城墙残高3米,宽10米,还设有排水管道,当为一座具备完整防御系统的高规格中心城市。城内发现有高台建筑F4,台高0.72米,房址残长15米余,宽5.7米,屋墙用土坯垒砌而成,四周还有灰坑、陶窑等遗迹<sup>[16]</sup>。笔者认为,其中高台建筑F4当具备早期首领官邸或祭祀神庙的功能,体现平粮台古城的社会复杂化特点,即部族首领地位进一步提升,从仅具宗教精神权威的巫师升格至初步拥有整合权力的首领,父系社会更加发达,酋邦社会模式开始过渡至早期城邦国家。而城内还有灰坑、陶窑和墓葬等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装饰品遗物,此外还发现铜渣,各房屋建筑也普遍使用土坯砌墙。这些都反映了这座数千年古城在当年的繁荣生产生活景象。

目前虽然在平粮台城址尚未发现能够说明太昊氏族的直接物证,但一件带有刻符的残缺陶纺轮或许带来一丝线索<sup>[17]</sup>。这件陶纺轮呈半圆形,其上有一阴刻符号,书写娴熟,自然流畅。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八卦中的“离”卦,故而证明这件纺轮乃至平粮台古城与太昊神话的关联。笔者认同该刻符与早期八卦有关的论点,因为“离”卦为“火”,火象征太阳之光明,故而这件陶纺轮不排除是映射太阳的天体崇拜遗物,太昊之“昊”即太阳之意。因此,作为部族首领的太昊及其后裔或为平粮台“陈”城址的首领人

物。这亦符合史载太昊从西北甘肃东迁至河南中原地区建都的历程。

## (二) 伏羲所都“宛丘”究

伏羲女娲之记载始见于战国文献,伏羲所都即在“宛丘”。对此,刘俊男先生认为伏羲活动地望就在今湖北与湖南地区<sup>[18]296-300</sup>。笔者赞同之,因为今湖北房县地区就有伏羲女娲庙,加之东门头石刻反映的伏羲形象,故而伏羲发源地当在湖北三峡地区。古三峡地区雄奇壮丽,山水迭起,古文化底蕴丰厚,是巫巴文明的诞生之地,而史载“太昊伏羲”即为巴人之始祖。

与8000年前出现“太阳人”伏羲石刻的湖北东门头遗址对应,同时段的湖南地区也发现了高庙文化遗存。湖南高庙文化遗址是反映长江中游地区原始祭祀内涵的集大成者,该遗址有一处面积上千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场所,相关配套设施齐全。我们认为,如此规模宏大的祭祀场所在当时是罕见的,反映了高庙先民丰富的祭祀活动,直接表明高庙遗址是一处区域信仰中心,相关人殉和物祭已相当成熟。这正如《国语·周语中·襄王不许请隧》所云:“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sup>[19]23</sup>作为高庙文化遗址发掘主持人的贺刚先生,他联系古史传说内容,认为高庙文化就是伏羲氏族所创造的<sup>[20]</sup>。我们赞同之,因为高庙文化盛行祭祀习俗和太阳崇拜,其飞鸟纹和八角星等图像当是部落图腾形象的重要彰显,而作为巫师职务的首领人物正是这种习俗文化的传播者。因此,作为出现了日神崇拜和“八卦”图像的高庙文化,其价值内涵不低于东门头遗址的“太阳人”石刻,是早期部族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和复杂的重要体现。

刘俊男先生认为上古时代的天文历法中心在长江地区,而伏羲所创八卦、太极图演化而成“河图”“洛书”,就最早体现在高庙文化陶器上的八角星等图像<sup>[21]</sup>。从时间上看,高庙遗址和东门头遗址都在距今8000年前,故而当年伏羲部族在此期间进行迁徙是有可能的,伏羲后来所都之“宛丘”或即沅水流域的高庙文化遗址。因此,无论是作为考古遗址的东门头、高庙,还是文献中太昊、伏羲的相异记载,皆证明伏羲与太昊实为二人,且其时段具有先后早晚的事实。古籍文献中,伏羲相关的最早记载是出现在战国以降,再至秦汉则其记载愈发详细,而伏羲和女娲也通常一并出现在文献中,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的神灵,如《文选·鲁灵光殿赋》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sup>[22]35</sup>对比之下,太昊则为单独记载的无女娲伴侣的独人身份。

伏羲时代处于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相交过渡的特殊阶段,故而与其妹女娲结成夫妻。即《独异志》所载:“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sup>[23]168</sup>而伏羲女娲由兄妹成夫妻并捏土造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先祖。是故,综合厘清相关考古遗物、文献及分析前贤们的相关论点,笔者认为,太昊是西北地区部落祖神,伏羲则是西南民族的始祖,而伏羲起始年份亦早于太昊,伏羲部族崇拜蜥蜴、鳄鱼以及蛇类,至太昊时代最终演化出龙图腾。

## 三、“伏羲女娲”图像遗物之嬗变

伏羲女娲的传说事迹在出土文献《楚帛书》中也得到彰显。楚帛书相关文章内容记载了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再有四个儿子的故事。虽然《山海经》等更早的文献中就载有女娲神的单独事迹,但在《淮南子》之前,伏羲与女娲也没有文献记载的联系,故而《楚帛书》所载者当是最早将伏羲与女娲作为夫妻进行联系的文献。

在《楚帛书》中,记载了掌管夏时的伏羲女娲的次子“朱四单”。我们认为,由于炎帝即号为朱襄氏,名为神农氏柱,所以朱四单不排除即炎帝,也就是伏羲之子。对此,何光岳先生也赞同炎帝祖先就是伏羲<sup>[24]</sup>。火神炎帝是后世楚文化中的重要祖神,而作为楚文化源头的长江中游地区古文化脉络十分丰富且绵延不绝,早在新石器早期,长江中游史前社会就达到鼎盛,如伏羲所都“宛丘”之高庙文化。到了大

溪文化时期,三元宫类型的城头山遗址是距今 6 000 多年、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以及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或是伏羲高庙文化之后,其后裔炎帝血脉北上至澧阳平原建立的新都。

距今 4 000 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时期,发现一件疑似双人首共一蛇身的玉佩(图 7)<sup>[25]</sup>。《山海经》载三苗族有着蛇身形象神的崇拜观念,而石家河古城作为三苗文化重要遗存,也是长江中游史前社会的最后高峰,不排除也是炎帝脉系的文化中心,故而伏羲后代的炎帝支系崇拜“人首蛇身”形象祖先神是合理之事。前面我们论述的三峡东门头石刻和甘陕地区陶罐图像,皆人首蛇身单一神灵形象,而这件双人首蛇身形象遗物不排除即是后世伏羲女娲双神交尾图的肇始。《楚帛书》文字四周的“十二月神像”出现了一个蛇身形象的“余”神像(图 8)<sup>[26]</sup>。其头部还不是人形,是一种类似饕餮的形象,躯体则为双蛇身缠绕,这基本与殷墟侯家庄大墓发现有双蛇交尾造型的木器一致。笔者赞同刘渊临与朱彦民两位先生的论点<sup>[27]</sup><sup>38-46</sup>,这种双蛇交尾造型是象征甲骨文中“东母”“西母”的“虺”神形象,或许就是后世伏羲女娲交尾造型的重要来源。



图 7 谭家岭遗址双人首蛇身玉佩

图片来源:院文清.石家河遗址谭家岭新发现玉器鉴赏[J].收藏家,2017(8):5.



图 8 《楚帛书》“余”形象

图片来源:李丹阳.伏羲女娲形象流变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2):146.

另外,战国中晚期一座楚地墓葬中发现一件颇为精美的纯银贴金带钩(图 9),构思精妙,工艺精巧,运用了贴金装饰工艺,将人首蛇身的体态与钩体的形态相结合。笔者赞同学界普遍认为是反映伏羲神像的说法<sup>[8]</sup><sup>44</sup>。但从整体形制看,如此造型的金饰件在当时中国还比较稀有,特别是整体形制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故而此金饰件或为西域甚至更远地区的舶来品。由于战国时期西域及其更远地区已与中原发生文化交流,因此中国墓葬出土外来遗物是有可能的。从金饰件形制看,这种形象的遗物甚至和古希腊特里同浮雕的造型如出一辙,故而这件伏羲神像遗物抑或结合了希腊海神的造型(图 10),体现了希腊文化经中亚南亚地区再东传至中国的历程。而这件楚墓中的伏羲神像带钩也说明最迟在战国时期,伏羲传说及其人首蛇身形象就已普及于荆楚地区,这更证明了伏羲起源地“南方说”的合理性。



图 9 公元前 4 世纪 战国人首龙身金饰件  
11.5X4.4 厘米 武汉博物馆藏



图 10 公元 1 世纪 犍陀罗地区海神特里同浮雕  
32×26×13 厘米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到了汉代,随着太昊与伏羲二人神话的结合,巴蜀地区大量画像石上的人首蛇身造型就是作为伏羲女娲的标准形象,这种形象多为双人首龙蛇身形象相缠绕,并以对偶神形制出现,突出明显的夫妻形态,伏羲持规,女娲持矩,两人也托举着日月。从三峡史前东门头“太阳人”伏羲形象看,那时的先民仅仅是产生对父系首领的崇拜意识,并将“日神”地位与其匹配。在日神成为父系首领独有“代理”后,母系首领的权威则或与新的月神信仰发生关联。伏羲、女娲亦为东王公、西王母之日月、阴阳双神信仰,如《礼记·礼器》所载:“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sup>[28]660</sup> 此即为日神一元崇拜发展成为对日、月二元崇拜,这点即在母系社会绵延流长的先秦三峡社会独有彰显。

前文我们已经论述,上古大神伏羲女娲的地望很可能就在三峡地区,恰好后世也在巴蜀地区发现了大量伏羲女娲对偶交合形象的汉画像砖,所以三峡地区独特的母系与父系对等权威发展历程,隐含着阴阳交合内涵的肇始。这些画像石在四川、山东、徐州等地区频频出现,有的还展现燧人、伏羲、女娲的石刻画像,即燧人氏立中,左右手分别抱揽伏羲和女娲<sup>[29]</sup>,多数伏羲女娲形象则两人蛇身作交缠状,下石还刻两小人,也是人首蛇躯。除普遍的人首蛇身造型外,不少对偶图上伏羲女娲的躯体也具有下足(图11),故而证明其下躯类似“龙身”形象。



图 11 四川合江张家沟二号墓伏羲女娲汉画像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 四、“人首龙蛇身”神煞俑意涵新论

人首龙蛇身形象由来已久,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史前多为部族图腾,先秦秦汉以来则固定为伏羲女娲的标准画像,北朝以来,它们形制展现为形形色色的“墓龙”“地轴”立体神煞俑。隋唐以来流行风水堪舆之术,“凡大葬后,墓内不立盟器神煞,亡灵不安”<sup>[30]3828-3829</sup> 的说法为人们接受。《大汉原陵秘葬经》即载公侯卿相墓葬中的神煞俑遗物各自分布在不同的方位。

人首龙身形象图案当是“墓龙”神煞俑的重要造型来源。人首龙身俑,或称人龙及人面龙,是一种人首和龙身结合的镇墓冥器,徐苹芳先生考证其为墓龙<sup>[31]</sup>。白冰先生则认为与道教中雷神有关,即主冬的西南之神火光流精君<sup>[32]</sup>。虽然学界对其名号存疑,但本文仍然采用“墓龙”的说法。当前学界对墓龙俑形制划分及其与人首蛇身形象地轴俑的区别存有争议及混淆,我们认为墓龙与地轴最大区别并非身躯是否拱曲,或是否两个人首,而在于是否具备手足爪状的部位造型,因为除了头部,龙与蛇最大差异即是否具有四肢。墓龙神煞俑全国发现的分布趋势,呈现为自北方向四周地区普及,具体形制则由复杂向简单转变,所陪葬的墓主阶层亦由低到高。

笔者赞同卢亚辉划分 AB 型墓龙的说法<sup>[33]</sup>, A 型即龙身拱起呈“几”字而不封闭,非仅人首,抑或兽首,有颈部及足爪(图 12); B 型则身躯拱起呈圆圈状,亦具足爪部位,而两端的人首前后相背(图 13)。但我们认为卢亚辉划分的 C 型则无足爪部,故而当为人首蛇身形象的地轴俑。北齐崔博墓发现的一件神煞俑被学界定为目前发现最早的人首蛇身地轴俑(图 14)<sup>[34]</sup>。由于其双人上肢着地,或非人蛇造型,实乃人首龙身之墓龙俑,其龙躯环形触地,我们定此造型为 C 型墓龙。此外南唐二陵发现的两件面部相背且身躯触地的光头墓龙俑亦为此造型<sup>[35]</sup><sup>127</sup>。我们认为,南唐政权吸收和借鉴了不少唐代的制度文化,所以其墓龙俑在葬俗上无疑与隋唐时期有着相关的文化共通性和渊源,南唐二陵中墓龙俑则形如光头僧人,或因墓主常年推崇佛教有关。所以,根据 ABC 三型划分,墓龙最大特点是具备手足爪状的部位,否则就是地轴俑。神秘的人首龙身形象神灵不仅出现在神话传说中,中国各地出土的文物中也有反映此造型的物品。



图 12 A 型墓龙代表



图 13 B 型墓龙代表



图 14 北齐崔博墓 C 型墓龙

图 12、13 来源:卢亚辉.唐五代墓葬所见墓龙[J].

文物春秋,2020(3):56-57.

图 14 来源:苏玉琼,蒋英矩.临淄北朝崔氏墓[J].

考古学报,1984(2):图版二三.

“地轴”二字题名,最早发现在广东海康的一座元墓中的刻砖上,此刻砖书写“地轴”,并刻画双人首蛇身图像(图 15)<sup>[36]</sup>。虽然大多数人首蛇身地轴俑的时代早于这件刻砖,但这抑或为人首蛇身神煞俑提供了重要的命名证据。人首蛇身俑亦作“地轴”“勾陈”,作为镇墓功能的冥器,流行于北朝至宋元期间。人首蛇身神煞俑目前在北方地域仅出土于山西、河北地区,南方则在江苏地区多有发现。不同地域的遗物其造型存在差异,有的人首处于两端,还有蛇身相交呈圈状,也有独头而背部隆起的,人首形制则有戴帽、发髻以及光头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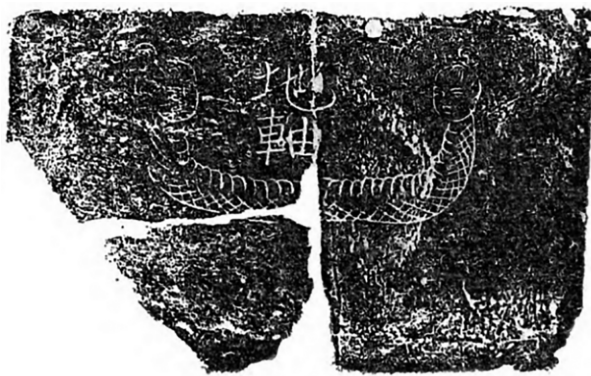


图 15 海康元墓双人首蛇身“地轴”刻砖

图片来源:张永珍.唐墓地轴的再认识——兼谈唐代镇墓俑组合[J].四川文物,2022(4):70.

目前,学界划分地轴的形制断定的说法不一,而笔者根据俑上是否具备上肢部位,没有的则为地轴俑(图 16),有的则是墓龙俑。我们也赞同当前学界的推断,这些地轴俑当为伏羲女娲形象及《山海经》中的神灵,可能与道教信仰有关。继汉画像砖之后,到了唐时,伏羲女娲传说已普传民间,并常出现在壁画、画册中。汉以来的人首蛇身画像已经明确其身份就是伏羲女娲,这种类型的画像流行至唐代。所



以,至迟在北朝,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已经从平面画像发展为立体物俑。伏羲女娲是生育神,绝大部分为人首蛇身,但也有人首龙身形象的,这种形象当是象征阴阳合一、平安祥和以及繁衍子孙万代的寓意,表达了对祖先的崇拜。即如《易传》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sup>[37]</sup><sup>103</sup>《荀子·礼治》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sup>[38]</sup><sup>74</sup> 故而此阴阳范畴或与交合观念有关。



图 16 山西长治崔挈唐墓出土地轴俑代表

图片来源:张永珍.唐墓地轴的再认识——兼谈唐代镇墓俑组合[J].四川文物,2022(4):74.

从地轴俑使用者的阶层看,上层权贵有帝王贵族,下层则涉及普通官僚及平民。可见当时各阶层的人士的墓中都广泛使用地轴等神煞俑。从南唐二陵中丰富的地轴俑冥器可以看出,当时南方十国政权虽然整体国力比不上北方中原五代,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及民众的精神追求却不输后者,无论帝王权贵还是平民人士的地轴俑习俗在唐宋之交的南方地区发展至顶峰状态。但从发现的遗物来看,地轴俑的肇始并非发生在南方地区,而是诸多士人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南下至江南地区,并带来源于墓葬习俗中河北因素的神煞俑传统。经济水平发展至一定高度后,人们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人首蛇身地轴俑作为墓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体现宗教信仰的涵义,这种习俗在东南地区盛行至巅峰,其原因无疑与唐宋变革导致的经济重心南移有着密切关联。

南北朝至五代十国,中华大地多连年天灾,又战事频繁,如此残酷环境下人们迫切希望得到拟人化神灵的护佑。首先,墓中神怪俑的形象多借助龙蛇形象之神灵,也很可能是对造人始祖伏羲女娲的崇拜,并期望逝者能与乘龙快婿幸福相伴,表明死者在地下世界仍然拥有曾经人间的一切,从而阴阳相生;其次,希望墓中伏羲女娲能够驱恶避邪,守护亡者精魂并在天堂获得再生,体现了东汉以来道家神仙思想的灵魂飞升、羽化登仙等观念影响;最后,地轴俑还是非常出色的艺术品,兼具浪漫主义与神秘色彩,并再现古代工艺家的审美,神煞俑人物的面目大多安详静谧,蛇躯身部则被描绘得灵动鲜活。

## 五、结语

考证上古神话传说时期的太昊伏羲线索,关涉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中华传统文化思维,以及中国祖先文化与图腾文化的关系等诸多复杂而综合的问题。通过对太昊伏羲氏作为传说中人文始祖的再探究,我们知晓“太昊”与“伏羲”二名均始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在汉代之前二名尚未连文。汉兴以来,其文化核心实为北方秦制与南方楚法之融合。高祖亦曾汉中为王,观巴人之舞并引入关中宫廷,加之汉初郡国并行之损益,故而需要构建南北统一之文化认同。所以太昊、伏羲在汉时合为一当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及政治情感。后世历代帝王皆祭祀太昊伏羲氏,以宣示王朝政权的正统与合法。如杜淳所言:“太昊与伏羲在五德始终说下合二为一,及空间与时间的结合,以作为百王之先,五德之首。”<sup>[39]</sup> 因此,“太昊”与“伏羲”并称是中国南北统一及王朝正统的象征。

“伏羲”年代早于“太昊”,“太昊”也或源于“伏羲”传说。笔者赞同屠武周先生认为伏羲远在炎黄之前,而太昊同时于黄帝的说法<sup>[40]</sup>。因为反映伏羲“形象”之三峡蛇身石刻及其“宛丘”之高庙文化遗址具 8 000 岁之先;而映射太昊“图腾”之西北龙身图案陶器及其都“陈”之平粮台古城则皆距今 6 500

年左右。二人图腾之“蛇”“龙”亦有所区别。故而从时空证据链论,伏羲、太昊实为二人并分掌古华夏之西南、西北地区。这也证明史前考古遗物所刻画形象符合传说中太昊伏羲“人首蛇身”“人面龙躯”等记载,证明了史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成熟的龙蛇图腾崇拜观念。

中国历史上,被发现反映人首龙蛇身形象的古代遗物主要有图像、画像砖、镇墓俑以及装饰品等。人首龙蛇身造型是先民对祖神形象的一种认知,如《山海经·北山经》:“……其神皆人面蛇身。”<sup>[41]67</sup>《海外西经》:“……人首蛇身,尾交首上。”<sup>[41]190</sup>《海内经》:“……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sup>[41]366</sup>等等。人首龙蛇身形象遗物有着漫长的嬗变历程。在远古时期多为器物上图案的描述,留下的实物也不多,至先秦时期始见人首龙蛇身造型的遗物。汉以来伏羲女娲形象多出现在墓葬的壁画、画像砖以及石棺和墓阙上,且图文并茂。唐时的图像载体则从画砖发展到绢画,至宋元时龙蛇身形象多以“墓龙”“地轴”神煞俑形制出现。这些遗物都表明了古人的生命认知、宗教情怀、精神寄托以及早期理性思维。

### [参 考 文 献]

- [1] 张兵,赵贤莲.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中半人半兽形象的演化及文化探原[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44-59.
- [2] 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
- [3] 武文.华夏文明七千载·太昊伏羲第一“龙”[J]. 社科纵横,1999(6):64-66.
- [4] 徐金法,张志华.华夏古老文明的源头——太昊伏羲东夷部落管理思想钩沉[J]. 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4):99-102.
- [5] 孙德萱,丁清贤,赵连生,等.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1988(1):1-4+29+113.
- [6] 闻一多.神话与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7] 申月琴.仰韶文化陶塑动物造型分析与当代雕塑创作转化[D]. 银川:北方民族大学,2025.
- [8] 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林梅村.伏羲、女娲与热舍龙王人首蛇身像考——兼论丝绸之路所见先秦至唐代工艺美术交流[J]. 装饰,2022(12):42-48.
- [9] 国家文物局,等.秭归东门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10] 冯恩学.三峡巴人崇拜太阳和使用贝币的实证[J]. 中华文化论坛,2000(1):29-30.
- [11] 杨阳,杨华.东门头“太阳人”石刻反映的天、人观念新释[J]. 农业考古,2025(1):35-42.
- [12] 国光红.太极图《易》与伏羲图腾[J]. 中国文化研究,2005(3):148-152.
- [13] 刘安.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23.
- [14] 王嘉.拾遗记[M].北京:中华书局,2022.
- [15] 董素芝.伟哉羲皇[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6] 曹桂岑,马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J]. 文物,1983(3):21-36+99.
- [17] 张志华,梁长海,张体鸽,等.河南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发现刻符陶纺轮[J]. 文物,2007(3):48-49.
- [18] 刘俊男.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 [19] 左丘明.国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
- [2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2006(7):9-15+99-100.
- [21] 刘俊男.“河图”“洛书”本义及原生地考论[J]. 湖南社会科学,2012(1):217-222.
- [22] 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3] 李伉.独异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22.
- [24] 何光岳.龙图腾在炎黄族团的崇高地位[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13-18.
- [25] 院文清.石家河遗址谭家岭新发现玉器鉴赏[J]. 收藏家,2017(8):3-8.
- [26] 李零.子弹库帛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 [27] 朱彦民.甲骨文伏羲女娲探踪[G]//张涛,等.周易文化研究: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28] 孙希旦. 礼记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9] 国光红. 沂南汉墓伏羲、女娲画像的文化内涵[J]. 走向世界,1998(Z1):72-74.
- [30] 谢缙. 永乐大典·大汉原陵秘葬经[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1] 徐苹芳. 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J]. 考古,1963(2):87-106.
- [32] 白冰. 雷神俑考[J]. 四川文物,2006(6):66-75.
- [33] 卢亚辉. 唐五代墓葬所见墓龙[J]. 文物春秋,2020(3):54-63.
- [34] 苏玉琼,蒋英炬. 临淄北朝崔氏墓[J]. 考古学报,1984(2):221-244+282-289.
- [35] 南京博物院. 南唐二陵发掘报告[M].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15.
- [36] 张永珍. 唐墓地轴的再认识——兼谈唐代镇墓俑组合[J]. 四川文物,2022(4):68-76.
- [37] 刘大钧. 易传全译[M]. 成都:巴蜀书社. 2006.
- [38]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22.
- [39] 杜淳. 太昊伏羲氏与王朝合法性[J]. 江西社会科学,2018(11):125-133+255.
- [40] 屠武周. 伏羲非太昊考[J]. 东南文化,1990(4):20-25.
- [41] 袁珂. 山海经校注[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

##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Human Head, Dragon and Snake Body” of “Taihao” and “Fuxi”

Yang 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an)

**Abstract:** “Taihao Fuxi” is regarded as the primordial cultural ancestor in Chinese legends. Although the names “Taihao” and “Fuxi” first appeare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y were not used together until the Han Dynasty. By examining the relics and sites that match the images and locations described in the legends of Taihao and Fuxi, it can be seen that early China had a mature dragon and snake totem and related worship consciousness. This also makes the evidence chain that Taihao and Fuxi were two different individuals, each govern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regions, clearer. The “dragon record” of Taihao indicates that his tribe’s consciousness was dragon worship, while Fuxi’s “snake body” proves the snake-worshipping mentality of the Fuxi tribe. Therefore, their totemic emblems and the regions they governed were different. Taihao was the ancestral god of the northwest tribes, while Fuxi was the progenitor of the southwest ethnic groups, and Fuxi’s era was earlier than Taihao’s. From prehistoric stone carvings and patterns to later paintings and tomb figurines, the evolution of these various archaeological finds carrying the “human head, dragon and snake body” form is continuous, all originating from the ancient dragon and snake totem of Taihao and Fuxi, and reflecting the spiritual sustenance and humanistic sentiments of the ancients regarding life cognition and religious beliefs.

**Keywords:** Taihao; Fuxi; human head, dragon and snake body; humanistic legends; spiritual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陈忻]